



“中华文明探源·何以中国”之发现篇④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文明探源·委员漫谈

石峁，相隔千年宛如初见

——专访石峁遗址考古队领队、陕西省政协委员、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

本报记者 司晋丽

不断的追问

叶小文

习近平总书记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

限于专业所限，我以前对考古并没有太多的了解。直到今年全国两会闭幕后，我们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群里开启了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讨，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深入地了解到考古的魅力。文明探源意义重大，然而，要拿出实证，则必须通过考古学家手中的武器。

王巍、袁靖、王震中等专家在读书群里现身说法，令大家了然，正是通过考古挖掘，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这些“明星遗址”，得以穿过历史尘埃，来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得以一睹先人之貌。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不只有灿烂的群星，还有不灭的人间烟火，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独有的馈赠。

在读书群中，有读者提问：“新石器时代，以农耕为基础的满天星斗、重瓣花朵的区域文化，为什么最后明月星稀，只有二里头文化一枝独秀？”

群里书友认为，这是个“大哉问”，极为深刻，需要深究。因为这一问题不仅涉及中华文明的起源，而且也涉及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何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一石激起千层浪，书友讨论纷纷。集各位高见，我认为，中国“大一统”传承的“一元”基础，也可以说，正是接地利、应天时、顺人和——地利天时人和。

“地利”，概括地说是一条长江、一条黄河，尽管奔腾千年、时而泛滥甚至改道，但一直孕育着、紧系着中华民族，这是不争的事实。顺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扩展开去，拉住长城内外（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都向着生产方式相对更先进的一端融合），走向大海大洋（顺流而下，进入南海、东海，深入太平洋）。所以，讲一元多样之“元”，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长江黄河，乃是承载中华文明“地利”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

如果“地利”是“形而下”的，“天时”就是载于“地利”之上的大趋势、大规律，是“形而上”的。

正是气候环境变化，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从森林走向农耕，人类文明就开始萌生了。青铜器极大地提高了农耕的生产力，二里头文明就诞生了。我认为，接地利、应天时，必致“顺人和”，即中华文明“始于一元多样，归于多样一体”，也即中国“大一统”传承的“一元”文化基础。

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的认知。中华文明距今5000年到4000年期间形成的各区域文明自发展交流共荣，转变为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进程，展示出多源汇为一体的发展路径。面向未来，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过程，需要在考古实证的基础上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论分析。同时，关于不同时期的文明发展历程还有许多谜题等待破解，尤其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特征还有待深入研究。只有在不断的追问中，我们才会距离真实最近。

这期“中华文明探源·何以中国”系列报道所展示的陕西石峁考古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缩影。在石峁，我们不仅感受到北方远古老城址的雄峻，更能体会到不同文明的交融交汇和兼收并蓄，在文明的涌动中，感通古今，追本溯源。收录石峁考古过程和资料的陕西考古博物馆是唯一一个以考古学命名的博物馆，对考古学理论方法，以及文物保护和重要考古发现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展示，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参观遗址，一定不要忘记造访这个考古博物馆。

中华文明“始于一元多样，归于多样一体”。把“一元”的圆心固守住，把包容的多样性（多线性）半径尽量拉长，画出最大同心圆，永固中华儿女大团结！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北方最大的一座城址”

对个人来说，要完整保存几十年的记忆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然而，有些文明却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漫游了几千年。

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镇的石峁遗址就是这样一种存在。这座城址初建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距今已有4000多年，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被誉为“石破天惊”的重要考古发现。

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枚玉器，通过考古学家的手铲，从黄土古道走来，与今人照面。它沉默不言，却是几千年朝代更迭、疆土变迁的见证者。这，令人对中华文脉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和敬畏。

孙周勇：您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加入石峁遗址考古工作的？可否大致梳理一下这项工作走过的历程？

孙周勇：作为陕西人，又是考古科班出身，我早就开始关注石峁了。石峁考古调查工作全面启动是在2011年，由我担任领队。自2012年开始持续大规模发掘后，我们首次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对遗址残存城墙的走向进行了测绘，确认了石峁遗址是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城和外城以石砌城墙为界的一座罕见大型石头城，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皇城台具备了早期“宫城”的性质，发现有玉器、石范、壁画等象征身份等级的“奢侈品”，以及铸铜、制骨等早期“核心技术”催生的生产遗存，这些实物为我们勾勒出当时石峁的“王”和高等级贵族们在台顶近8万平方米的空间生活的场景。2012年，我们公布了外城东门址考古新资料，这处有着两重城垣、规模宏大的史前城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现在，皇城台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

石峁遗址的考古挖掘是几代人集体性的成果。放在陕西考古、中国考古的历史中，每一代人都只是很小的一个片段。早在1958年，考古学者就首次关注到石峁遗址。从1976年开始，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几代人就几乎没有停止过在遗址上进行调查、勘探、发掘、研究，才形成一张比较宏观的图。很多上级领导到陕西省考古博物馆考察时，我都会讲解，挂在墙上的一张图、图上的每一个点背后，都有一群人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

记者：那么，石峁城址建于距今4000多年前，这个时间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推测的？

孙周勇：2010年，当时的神木县向陕西省文物局报告，说石峁遗址发现了大量玉器、陶器等文物。

孙周勇：您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加入石峁遗址考古工作的？可否大致梳理一下这项工作走过的历程？

孙周勇：作为陕西人，又是考古科班出身，我早就开始关注石峁了。石峁考古调查工作全面启动是在2011年，由我担任领队。自2012年开始持续大规模发掘后，我们首次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对遗址残存城墙的走向进行了测绘，确认了石峁遗址是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城和外城以石砌城墙为界的一座罕见大型石头城，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皇城台具备了早期“宫城”的性质，发现有玉器、石范、壁画等象征身份等级的“奢侈品”，以及铸铜、制骨等早期“核心技术”催生的生产遗存，这些实物为我们勾勒出当时石峁的“王”和高等级贵族们在台顶近8万平方米的空间生活的场景。2012年，我们公布了外城东门址考古新资料，这处有着两重城垣、规模宏大的史前城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现在，皇城台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

石峁遗址的考古挖掘是几代人集体性的成果。放在陕西考古、中国考古的历史中，每一代人都只是很小的一个片段。早在1958年，考古学者就首次关注到石峁遗址。从1976年开始，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几代人就几乎没有停止过在遗址上进行调查、勘探、发掘、研究，才形成一张比较宏观的图。很多上级领导到陕西省考古博物馆考察时，我都会讲解，挂在墙上的一张图、图上的每一个点背后，都有一群人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

记者：那么，石峁城址建于距今4000多年前，这个时间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推测的？

孙周勇：2010年，当时的神木县向陕西省文物局报告，说石峁遗址发现了大量玉器、陶器等文物。

链接

（一）皇城台

皇城台的考古发掘始于2016年，目前已揭露出皇城台门址及东护墙北段上部及台顶大台基南护墙，是石峁最核心的工程区域，作为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的早期宫城，皇城台层层设防、众星拱月般的结构奠定了中国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

皇城台门址由广场、瓮城、南北墩台、门道等组成。广场由基本平行的两道石墙围成，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在外瓮城外侧的墙根处，发现完整玉钺两件。门道内为石板铺砌的路面，陡坡状攀升至台顶，路面的部分石板上发现阴刻“符号”。最新考古发掘中，门址和东护墙北段上部出土的陶、骨、石、玉、铜等各类遗物数以万计。皇城台发现的制作铜器的石范，为国内已知最早的铸铜遗存之一；陶瓦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国内数量较大、区域位置最北端的发现，暗示着台顶存在着覆瓦类高等级建筑；“弃置堆积”

中出土的万余枚骨针以及“制作链”各阶段的相关遗物，暗示着皇城台顶部可能存在着大型制骨作坊。皇城台还出土有不少于20件的骨制口簧，口簧在现代被叫作“口弦琴”，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口簧。2018年在台顶发现了的几代人就几乎没有停止过在遗址上进行调查、勘探、发掘、研究，才形成一张比较宏观的图。很多上级领导到陕西省考古博物馆考察时，我都会讲解，挂在墙上的一张图、图上的每一个点背后，都有一群人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

记者：那么，石峁城址建于距今4000多年前，这个时间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推测的？

孙周勇：2010年，当时的神木县向陕西省文物局报告，说石峁遗址发现了大量玉器、陶器等文物。

孙周勇：倘若在石峁发现大量的石范之前，我首选的肯定是1976年发现的一批27件牙璋，这个牙璋被认为可能是后来流行在东亚地区的牙璋的形制和发源地。现在，我会选择皇城台的石范。石范原本

重要遗迹，由内外瓮城、南北墩台、门塾等设施组成，周边地层及遗迹中出土了玉钺、玉钺、玉璋、牙璋、陶器、壁画和石刻画像等重要遗物。

外城东门一带石墙内埋葬玉器的现象尤为引人注目。根据其出土状况分析，这些玉钺、玉璋、玉钺等器物应是城墙修建过程中有意嵌入墙体的。石范遗址所见将玉器置于墙体之内的现象，或符合上古文献或神话中提到的玉门、瑶台、璇门的相关记载。作为石峁人在信仰层面的驱鬼辟邪观念催生的精神武器，石范外城东门址所见杀戮奠基及墙体藏玉现象，极

大满足了辟邪神话寄托及“宗教中心”的向心功能，也成为其凝聚周边中小型聚落的核心手段。外城东门址是中国史前城址上规划最为复杂、设施最为齐备的实例，设计精巧、结构复杂、装饰华丽，筑造技术先进，被誉为“华夏第一门”。

（三）韩家圪旦居址与贵族墓地

韩家圪旦系石峁城址内城的一处居葬遗址，出土陶、骨、石器千余件。韩家圪旦点发掘的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规模在2平方米以上，最大者长约4米，宽约3米，深6米，墓室面积12平方米；最小则仅可容身。规模差异显而易见。

（四）樊庄子哨所

樊庄子哨所位于石峁城外的东南方向，与外城南墙上的一处城门隔沟相望，与外城城墙直线距离约300米。哨所系在自然土阶顶部垫土找平后修筑石砌建筑。石砌建筑可分为内外两层“石围”，内围位于山阶顶部正中，平面大致呈东西向长方形，长约14米，宽约11米。除外墙外，其余三面墙体保存比较完整。根据方形石围内侧均匀分布的壁柱槽分析，或应为一座用于支撑的“穹顶”的壁柱槽，其功能或与登高望远瞭望哨有关。樊庄子哨所与其他四座同类遗址共同构成城外的“预警系统”。

（口述：孙周勇 整理：司晋丽）

从消息推测，我想这个地方肯定非同一般。我们团队也几次到遗址去考察过，看到了后来被确认为城墙的石墙。但刚开始为什么没能认定这是一座石城？因为石墙是断断续续的，加之过去大部分学者认为石墙包括皇城台一些护墙，可能是战国时期秦长城的附属设施，谁都没有推测到会是城墙。转折点是2011年我们进行的大规模考古调查。我们把整个区域10多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跑遍了，然后绘制成一张图。当把石墙和龙山时期的遗物匹配到一张图上以后，发现有一个高度的吻合，直观判断它应该是龙山晚期的一座城，如果确认的话，将是整个北方地区最大的一座城。后来也是通过与龙山文化时期的典型遗物相关联对比，判断到石峁遗址能追溯到4000多年前，也就是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所建规模最大的城址。一些学者还从聚落和社会的层面进行了相关研究，甚至上升到文明或国家起源的高度，认为石峁可能已经进入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

记者：跑遍10万平方米，一定是个艰辛漫长的过程吧？

孙周勇：“广大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青灯黄卷”。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画面。现在回想起当时还是略带心酸的。1996年我们去榆林考古，虽然在一个省内，但铁路还没有通，我们开一辆吉普车，一走就是三天，忍饥挨饿也是常事。后来，我国第一条沙漠高速——榆林到靖边高速公路开通后，我们就坐一晚上大巴车，历经十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到了开始工作。即使在考古发掘工作大规模启动早期，考古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依然很艰苦，没地方住，就住老乡家废弃的窑洞；没水喝，就喝窑水；手机信号基本不通。现在的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了——西安到榆林的航班每小时就有一趟，和公共汽车一样便利，开车的话6个小时就能到达。遇到野外一些复杂路况，普通车辆到不了的地方，可以租辆越野车。我们还在当地建起了自己的办公室。

在文化的交流中体现了“多元一体，兼容并蓄”

记者：近年，随着文博类综艺节目的播出，让文物开口“说话”成了一个流行的现象。如果您选择一种能代表石峁的文物，就是您会选择哪一种？

孙周勇：倘若在石峁发现大量的石范之前，我首选的肯定是1976年发现的一批27件牙璋，这个牙璋被认为可能是后来流行在东亚地区的牙璋的形制和发源地。现在，我会选择皇城台的石范。石范原本

重要遗迹，由内外瓮城、南北墩台、门塾等设施组成，周边地层及遗迹中出土了玉钺、玉钺、玉璋、牙璋、陶器、壁画和石刻画像等重要遗物。

外城东门一带石墙内埋葬玉器的现象尤为引人注目。根据其出土状况分析，这些玉钺、玉璋、玉钺等器物应是城墙修建过程中有意嵌入墙体的。石范遗址所见将玉器置于墙体之内的现象，或符合上古文献或神话中提到的玉门、瑶台、璇门的相关记载。作为石峁人在信仰层面的驱鬼辟邪观念催生的精神武器，石范外城东门址所见杀戮奠基及墙体藏玉现象，极大满足了辟邪神话寄托及“宗教中心”的向心功能，也成为其凝聚周边中小型聚落的核心手段。外城东门址是中国史前城址上规划最为复杂、设施最为齐备的实例，设计精巧、结构复杂、装饰华丽，筑造技术先进，被誉为“华夏第一门”。

（三）韩家圪旦居址与贵族墓地

韩家圪旦系石峁城址内城的一处居葬遗址，出土陶、骨、石器千余件。韩家圪旦点发掘的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规模在2平方米以上，最大者长约4米，宽约3米，深6米，墓室面积12平方米；最小则仅可容身。规模差异显而易见。

（四）樊庄子哨所

樊庄子哨所位于石峁城外的东南方向，与外城南墙上的一处城门隔沟相望，与外城城墙直线距离约300米。哨所系在自然土阶顶部垫土找平后修筑石砌建筑。石砌建筑可分为内外两层“石围”，内围位于山阶顶部正中，平面大致呈东西向长方形，长约14米，宽约11米。除外墙外，其余三面墙体保存比较完整。根据方形石围内侧均匀分布的壁柱槽分析，或应为一座用于支撑的“穹顶”的壁柱槽，其功能或与登高望远瞭望哨有关。樊庄子哨所与其他四座同类遗址共同构成城外的“预警系统”。

（口述：孙周勇 整理：司晋丽）

石峁遗址的几处重要考古发掘

韩家圪旦地点早期作为居址使用，晚期考古研究时居址废弃，作为墓地使用，聚落功能发生了巨大的更替。虽然该墓地被严重盗扰，但仍然从规模上能够判断其为石峁遗址内的一处大型贵族墓地，墓地主人出现了身份差异及等级区分，社会复杂化倾向加剧。

（四）樊庄子哨所

樊庄子哨所位于石峁城外的东南方向，与外城南墙上的一处城门隔沟相望，与外城城墙直线距离约300米。哨所系在自然土阶顶部垫土找平后修筑石砌建筑。石砌建筑可分为内外两层“石围”，内围位于山阶顶部正中，平面大致呈东西向长方形，长约14米，宽约11米。除外墙外，其余三面墙体保存比较完整。根据方形石围内侧均匀分布的壁柱槽分析，或应为一座用于支撑的“穹顶”的壁柱槽，其功能或与登高望远瞭望哨有关。樊庄子哨所与其他四座同类遗址共同构成城外的“预警系统”。

（口述：孙周勇 整理：司晋丽）



更多报道见
人民政协报
微信公众号